

中国英语之争及有关思考^①

李 秀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苏 连云港 222003)

摘要: 学术界对于中国英语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中国英语的界定、中国英语的可接受性标准及其所具有的语言特征等问题上。通过对这些争论进行分析和探讨,我们首先对中国英语进行了重新界定,其次讨论了中国英语的可接受性标准,认为对它的裁决应该取决于它的交际效果,取决于它是否已经成为一种群体性的语言而广为使用。最后,我们探讨了中国英语的语言特征,认为它体现在语音、词汇、句式和篇章三个层面。

关键词: 中国英语;争论;界定;可接受性;语言特征

中图分类号: H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0)05-0123-04

The Arguments on China English and Its Relevant Thinking

LI Xiu

(Department of Fundamental Education, Lianyungang Teacher's College, Jiangsu 222003, China)

Abstract: The disputes over China English focus primarily on its definition, criteria of acceptability and language features. By analyzing and discussing these issues, this paper firstly redefines China English, then points out that the acceptability of China English depends on its communicative effects and whether it is widely used by the mass. At the end, it discusses the language features of China English and holds that China English mainly exists in pronunciation, vocabulary, and text.

Key words: China English; arguments; define; acceptability; language features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的形势下,英语已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性语言。同时,长期频繁的语言接触使得英语在世界各地产生了变异,带有地域色彩的英语变体在各国对内或对外交际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中国,英国传教士 Robert Morrison 开创了教授英语的先河。时至今日,英语在中国已经存在了 200 多年。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长河中,英语跟中国文化接触日趋紧密,自然负载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内容,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特征不可避免地要带到英语中去。最终中国英语这一说法应运而生。最先提出这一概念的是葛传槩^[1]先生,此后,中国英语及其研究引起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时至今日,绝大多数学者认可了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但是,由于中国英语的研究起步较晚,有关中国英语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形成定

论,有关争论也就异常激烈。这些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中国英语的界定、中国英语的可接受性及中国英语的语言特征等问题上。本文拟对以上争论进行探讨和反思,并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解,希望能对中国英语的研究有所启发。

一、中国英语的界定之争

早在 1980 年葛传槩^[1]就提出中国英语这一概念,当时葛先生意识到了不少有中国特色的概念需要表达,而这些概念在英语中没有现成的表达方式,如“四书”“五经”等,所以只好译成“Four Books”和“Five Classics”。他将这样的英语称为中国英语。但他并没有界定什么是中国英语,也没有指出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和一直被赋予贬义的

① 收稿日期: 2010-05-25

作者简介: 李 秀(1972-),女,江苏省赣榆县人,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英语语言学研究。

中国式英语(Chinese English)有何区别。

自此之后,陆续有学者就中国英语的界定,以及它与中国式英语的区别进行了探讨。榕培^[2]指出,中国英语的定义应包括三个部分: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点的。他认为中国本土上使用是中国英语存在的前提。至于“标准英语”,榕培认为它既不是指纯正的英国英语、也不是指纯正的美国英语或其它国别变体,而是英语的一种特殊的方言、唯一非地区性的方言,没有明显变异、可以到处通用,说话的口音不受限制。虽然这种标准英语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榕培认为,中国英语若离开了“标准英语”这一核心,也就不能成为英语了。榕培将中国英语的第三个条件定位“有中国特色的”,显然是他已经意识到了中国文化对中国英语的影响。在榕培看来,中国英语的产生与中国文化休戚相关,正是中国文化使得中国英语具备了中国特色。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榕培对于中国英语的界定已经较为全面,但他没有指出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根本区别;并且他对中国英语界定的前两条标准“对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和“以标准英语为核心的”的论述受到了其他学者的质疑。李文中^[3]扩展了汪榕培的“本土化”概念,指出不应该把中国英语的使用局限于中国本土,它亦可超越本土。我们比较赞同李文中的观点。事实上,中国英语的使用范围没有疆域的限制,凡是需要表达中国人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思维特征的场合都可能存在中国英语的使用。另外,李文中在论述中国英语的界定时,还用“以规范英语为核心”替代了榕培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李认为,现在连英美这样的内核国家的英语都不能称之为标准英语,可见标准英语并不存在。可以将合乎英语语言普遍规则,为英语国家所理解和接受的英语作为规范英语。李文中对规范英语的内涵的论述和榕培的对标准英语的论述内涵基本一致,但规范英语这个说法似乎更中立一些。

在中国英语及中国式英语的差异问题上,李文中最先提出了他的观点。他指出中国英语是指“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3]19}“至于中国式英语,则是指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和使用者由于受母语的干扰和影响,硬套汉语规则和习惯,在英语交际中出现的不合规范英语或不合英语文化习惯的畸形英语”^{[3]19}。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李文中区分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

的主要标准是是否受母语干扰。但他的这一标准的论述同样遭到了其他学者的异议。谢之君^[4]就认为有无汉语干扰不能作为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的区分标准,“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都存在着汉语干扰,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杜争鸣^[5]发表了与谢之君基本一致的观点。他认为中国英语中所谓的汉语干扰反映了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和思维习惯,是中国特有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某些所谓的“干扰”,实际上是无法排除的。杜争鸣还就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中的区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式英语是中国学生在学习英语过程中所使用的“过渡语(interlanguage)”。它与中国英语虽然有相似之处即都有汉语的影响,但是二者的差异更大:前者一般对个体语言特征而言,而后者则是对群体语言特征而言;前者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一般情况下总是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而后者至少在理论上应该是相对稳定的,其发展变化必须以社会文化的发展为前提;前者之中的汉语成分或思维模式的介入主要是无意识的或不如人意的,其负迁移往往与正迁移互相抵消,而后者则是有意识的,用以满足中国人的特殊要求或目的,其负迁移始终被压低到最低量,正迁移则被发挥到最高限度。我们认为杜争鸣对中国英语的讨论具体而且比较中肯,他对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区分,在帮助我们区分词汇层面的英语使用是否为中国英语是可以借鉴的。例如像用 watch sister(表妹) dead enemy(死敌)这样的词组我们依据上述标准很容易界定它们是生搬硬套汉语成分的中国式英语,但像“一箭双雕”的译语“shoot two hawks with one row”,“雨后春笋”译语“like bamboo shoots after rain”和“纸老虎”的译语“paper tiger”都涵盖了中华特有的文化底蕴,这些英语表达中的汉语成分的介入是有意识的,属于中国英语的范畴。在语篇层次上,我们认为杜的观点“中国英语中汉语成分或思维模式的介入是有意识的”并不合适。事实上,句式和篇章结构都是一个民族或群体的思维方式、思维模式的深刻映射,在中国英语的句式和篇章层面,汉语成分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介入往往是无意识的,不由自主的。因此,我们认为,不能将汉语成分或思维模式的介入是否有意识作为界定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区别。区分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不必强调是否有汉语的干扰。只要不妨碍交际,并承载一定的文化负荷,都应该看作中国英语加以接受。

以上学者的论述分别从不同方面论述了中国英语的内涵,也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英语的研究

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但无可否认,他们的观点中也都存在各自的缺陷。我们借鉴以上各位学者的论述,对中国英语进行了重新界定:(1)以规范英语为核心。(2)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及中国人思维方式。(3)具有中国特点和群体性语言特征。“以规范英语为核心”是中国英语存在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一前提,中国英语的使用就会陷入混乱,中国英语的系统性和可接受性就会受到破坏。“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及中国人思维方式”是中国英语客观存在的主要依据。“群体性语言特征”是鉴定某些英语使用是否是中国英语的主要手段。依据此标准,我们认为,中国式英语,与此相对,是只具有个体语言特征的,极不稳定的,生搬硬套汉语规则和习惯的,严重影响交际的中介语。它们是学习者学习过程中因为英语能力的欠缺和汉语母语的干扰所产出的错误英语。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虽然同在一个连续体上,但是它们之间有质的差异,后者向前者转化的可能性也非常有限。

二、中国英语的可接受性之争

在界定中国英语的系列问题中,还有一个讨论的焦点,这就是中国英语的可接受性或认同问题。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英语必须为讲英语国家的人理解和接受;在提出有效交际的标准同时,同样认为中国英语依赖于操规范英语者的认同^{[4]3}。对于这一观点,李少华^[7]首先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将中国英语的认同权交给别人,中国英语与其说缺乏标准,还不如说缺乏自信。中国人学英语不仅仅是同美国人和英国人交流,还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进行交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论是使用美国英语还是使用英国英语都不妥。最佳的选择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使用英语。朱跃^[8]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中国英语在对外交流的过程有可能会引起误解,但这种误解在跨文化交际中具有积极的作用,“没有文化的冲突,就没有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不同文化的平等性。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双方相互尊重彼此的文化,是个双向行为,不是单向行为,不能简单地把‘符合英语文化习惯’作为判别中国英语的准绳”。我们同意李少华和朱跃的观点。在随着英语的全球化及本土化的过程中,英语不再属于所谓的英语国家所有,它已经作为中性的媒体,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国国内和国际的交流与合作中。在交际中,它应该有着自己民族文化的标准来界定其交际价值。中国人使用的英语到底是不是中国英语,不应该交给

所谓的“操规范英语者”去裁决,而应该取决于它的交际效果,取决它是否已经成为一种群体性的语言而广为使用。因此,非常形似中国式英语的 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和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人山人海)由于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应用,就应该是中国英语而不是中国式英语。

三、中国英语的语言特征之争

中国英语有哪些语言特征?这些语言特征体现在哪些方面?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也非常热烈。这些争论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语言只存在在词汇层面,根据是 Kachru 的同心圆学说^[10]。根据这一学说,全球的英语可以划为内圈英语(包括以英语为母语的如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英语)、外圈英语(即以英语为第二语言或官方语言的国家的英语),以及扩展圈英语,如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等一些国的英语。中国人所使用的英语属于扩展圈内且没有融入日常生活的变体类,因此像中国英语这样的变体因其词汇层面所表达的内容具有特色才得以存在,在形式上则没有典型性。^{[11]12}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语言不仅存在于词汇层面,也存在于语音、句式和语篇层面^{[3]14}。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们认为任何语言和语言变体都是体系的,一个语言变体之所以能被称为变体,它就必然在语音、词汇、句式、语篇等各层面都具有其自己的特征。我们赞同后者的观点。正如 Halliday, M. A. K & R. Hason^[15]所指出的那样:语言具有很强的自我监督机制和改变不同形式以适应不同语言环境的能力。语言的变体形式多种多样,而且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各种语言之中。一种语言使用的人数越多,范围越广,就越容易产生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变异分化,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形成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区域性变体”。由于词汇是展示社会生活最为丰富的语言层面,在对中国英语的论述中,研究最多、最系统的就是对词汇层面的研究,鉴于此,词汇层面的中国英语论证就没有必要了。下文中我们将阐释中国英语在语音层面及句式和篇章层面的存在问题。

在语音层面,中国学者早就指出了国人在音段音位方面所表现出的系统与标准英语的系统的不同,如英语有 48 个音素,而汉语共有 40 个。由于英语属于印欧语系,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两种语言在语音上存在很大差别。例如英语有长短音而汉语中没有,导致中国学习者往往很难区分英语单词中的长短元音如 /i:/—/i/, /u:/—/u/;再如,英语音节内有辅音串运用,英语的一个音节内元音音素

前后可分别出现三个或四个辅音音素。中国人不习惯这种辅音串的发音,就很自然地在辅音串的各辅音之间加上元音音素,使辅音串消失等。国内的学者对音段音位的研究已经较为详细,在此就不再一一赘述。目前也有学者认为,中国英语音位层面的特点应主要体现在超音段音位层面,如重音、音渡、弱化、同化、连续等^[16]。这些方面的“中国特色”根深蒂固,难以根除。因为正是语音系统的这些差异决定了中国英语的语音特色:有些音发音难,语调平坦,词重音和重音不突出,很少有连读。目前,关于中国英语在超音段音位的研究还不全面,还需作进一步的探讨,但这些描述足以证明中国英语语音的中国化是客观事实。

句式和篇章结构与思维方式、思维模式有关。它们反映了人们对现实的认识所凝固成的经验和习惯。中国人的宇宙观、价值观、文化传统、社会习俗、人文地理、政治制度都不同于西方社会,这些差异也必然在句式和语篇上体现出深刻的不同。对这些差异李少华^[7]有比较完整的论述。如英语民族自古逻辑学发达,思考缜密。反映在句式上,句子长,结构复杂,各句子成分间连接紧密。汉语弹性比较大,句子简短,动词较多,行文一般按动作发生的先后顺序排列。谢之君^[4]在对杨宪益夫妇和H·Hawke, John Minford两种《红楼梦》译本的研究中发现:杨译不少地方有中国英语特点,如句式较短、关系词少等。杨宪益夫妇汉语文化知识渊博,英文功底深厚,但翻译中仍因袭汉语的一些特征,真实地反映了原文。这也说明中国英语只要应用得当,就能在表达中国特有事物中起到独特作用。在篇章结构上,中国人总体上是归纳型思维,而英美人是演绎型思维。所以,中国人组织篇章喜欢先有铺垫,最后点出主题,英美人习惯于开门见山,直入主题。这些差异也明显地呈现在中国人的写作和宣传资料中。我们认为,中国英语的语篇特色是汉文化思维方式和英语语言形式的结合,是对英语语言的发展和丰富,我们不能以“不标准”、“不地道”而煞费苦心地把它剔除掉。

目前,中国英语语篇层面的研究是中国英语研究最为薄弱的方面。已有的研究多为经验式的,我们还缺乏基于数据库的系统研究。但不论如何,语篇层面的中国英语现象已不容置疑。

中国英语把中国文化和英语结合起来,不仅丰富了英语内容,还承担着翻译和描写中华文明中的

特有事物和中国意念、文化传统的重要任务,成为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媒介。尽管中国英语还不稳定、不成熟,也没能产生系统性的分化变异,但也在语音、词汇、句式和语篇层面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针对中国英语的争论也还在继续,但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的强大和政治地位不断提升及英语在中国的普及,对中国英语的研究必将更加系统、深入。这些研究将促进中国英语的健康发展,也必将对我国的英语教学产生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葛传棻. 漫谈由汉译英问题[J]. 翻译通讯, 1980(2): 1-13.
- [2] 榕培. 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1(1): 1-8.
- [3] 李文中. 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3(4): 18-24.
- [4] 谢之君. 中国英语: 跨文化语言交际中的干扰性变体[J]. 现代外语 1995(4): 7-11.
- [5] 杜争鸣. 中国英语问题及其它[J]. 外语教学, 1998(3): 6-14.
- [6] 孙 驷. 英语国别变体的研究和英语在中国[J]. 外国语, 1989(2): 25.
- [7] 李少华. 英语全球化、本土化视野中的中国英语[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4).
- [8] 朱 跃. 对近20年“中国英语”争论的反思—兼谈中国英语教学改革[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1): 128-133.
- [9] 李少华, 王万平. 中国英语和中国英语教学[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02(2): 33-37.
- [10] KachruBrajB. *Institutionalized second language varieties* [M]. Sidney(ed.): Greenbaum, 1985.
- [11] 王建国. 中国英语研究存在的问题[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11): 14-19.
- [12] 邱立中, 宁全新. 中国英语质疑——与杜瑞清、姜亚军先生商榷[J]. 外语教学, 2002(6).
- [13] 杜瑞清, 姜亚军. 近二十年“中国英语”研究评述[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1): 37-41.
- [14] 金惠康. 中国英语的语用环境和语用功能[J]. 福建外语, 2001(2): 12-15.
- [15] Halliday, M. A. K & R. Hason.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M]. Victoria: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1985.
- [16] 姜亚军, 杜瑞清. 有关“中国英语”的问题[J]. 外语教学, 2003. (1): 27-35.

责任编辑:李珂